

奕訢与戒台寺牡丹院

◎国宝档案——

戒台寺为北京西山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，自唐即已存在，原名“慧聚寺”。寺内的戒坛殿为核心建筑，戒坛创建于辽代咸雍五年（1069年），明代正统年间，兴建戒坛殿，戒坛殿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，有中国三大戒坛之首的称谓，因此，戒台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皇家的重视。

戒台寺千佛阁北面，有一座二进的四合院，名为牡丹院，它是戒台寺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造园特点兼具北方浅山与江南园林的风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晚清重臣恭亲王奕訢与这个院落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
奕訢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，生于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，逝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。幼时，皇四子奕宁（后来的咸丰帝）与他同在书房读书。咸丰帝即位后，奕訢被封为恭亲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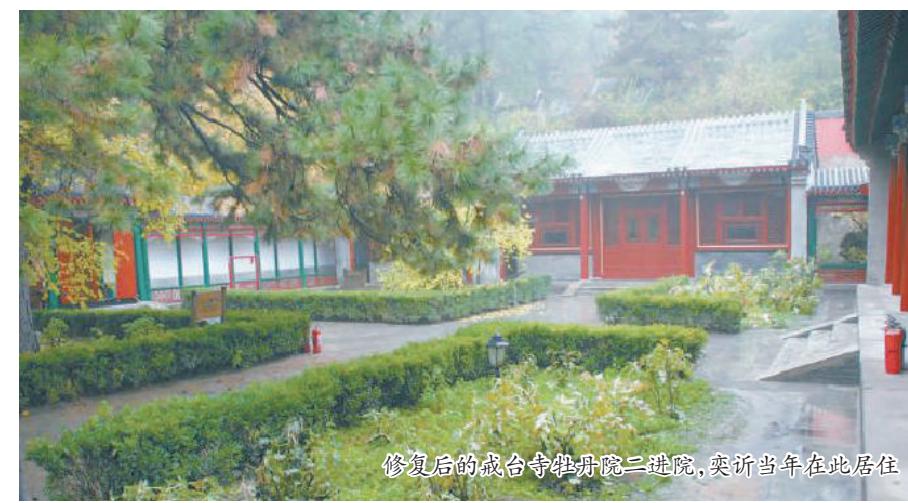
奕訢担任过正红旗族长、宗人府宗令、军机大臣等职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占天津、逼近北京，奕訢被任命为全权大臣，留守北京，负责与英法联军进行谈判，此后他专门负责外交，处理洋务。

1861年，咸丰帝病逝，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，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，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，即为同治帝。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。

没多久，慈禧对奕訢心生猜忌。据史料记载，两宫太后对恭亲王的猜忌始于同治四年三月，“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，内廷召对，时有不检，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。”虽然免了议政王的职务，但是奕訢“仍在内廷行走，管理总理各国务事衙门”。

至此奕訢开始对朝野权力纷争产生厌倦，渴望远离清廷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因在中法战争中办事不利，“太后谕责王等萎靡因循，罢军机大臣，停双奉。家居养疾”。为避风雨，奕訢开始遍游名胜古迹，因西山戒台寺离京城较近，且为皇家寺院，奕訢便以养病为由，举家于光绪十年来到戒台寺，移居北宫院。当年康熙、乾隆等皇帝均曾驻跸北宫院。

奕訢及其家人在戒台寺居住长达十余年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恭亲王看到戒台寺的罗汉堂、千佛阁等建筑残破不已，便捐资重修。据《重修万寿寺戒坛碑记》载：“予偶游览至此，何胜钦悚，因其罗汉堂、千佛阁等处，或患剥



修复后的戒台寺牡丹院二进院，奕訢当年在此居住

落，或将倾圮，捐资修建之。其地有俗称北宫者，亦复其崇隆之旧额，以慧聚堂取存李唐遗意也……”也就是说，在重修戒台寺内的部分殿堂时，他还建了自己在寺内所住的北宫院，他亲笔题额为“慧聚堂”，沿用的就是戒台寺的旧称：慧聚寺。后来因院内广植牡丹花，所以又称“牡丹院”。如今该匾悬挂在戒台寺一小院门额上，落款有“皇六子”和“恭亲王”章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，恭亲王因疾薨，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就此陨落。慈禧在懿旨中对其给予极高评价：“三十余年，恪恭奉职，殚竭忠忱。其间养疾家居，旋复起膺机要，朝夕从事，力任其难……”

此后，牡丹院历经一百多年风霜雨雪的侵蚀，缺

乏系统的修缮和维护，院内建筑破损严重。为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，向世人展示戒台寺在清代的历史沿革、建筑规制等，2015年开始进行修缮保护，恢复这组清代建筑的历史原貌。

因为恭亲王与牡丹院的历史渊源，此次修缮过程中以恭王府花园的结构特点为参照，参考恭亲王于戒台寺留下的诗作，恢复院内景观原貌。这次修缮是戒台寺牡丹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修缮工程。对院内建筑彩绘的修缮保护，是此次修缮工程的重点，也是难点。

相关部门依据设计图纸方案并结合牡丹院中建筑彩绘自身特点，对彩绘的保护制定了两种方案：一是彩绘出现破损的，依据遗存彩绘进行复原，二

是对于彩绘损毁严重，无法确定图案的，按照建筑位置和等级绘制。在绘制过程中使用传统工艺、运用传统材料组织施工。通过上述方法对院内原彩画进行修复，使得非常珍贵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老彩绘得以传承保留。

通过此次修缮，这座清代皇家古建筑恢复了昔日的风貌，成为研究清代建筑及园林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牡丹院的一进院由南房、东配房、东南转角房、假山及花坛组成。南房用于客房、书房、仆人居住。二进院由垂花门、北房、东西配房及游廊组成，以南北纵轴对称布置，院落封闭独立。正房两侧耳房处以假山堆砌作为点缀。正房前面，甬道两侧，种植古松树和古丁香树。正房5间

原为奕訢居住之地，东西两厢各有3间配房，是福晋的住处。内院四周游廊环绕，院中牡丹芬芳争艳，雍容华贵。

戒台寺素以奇松闻名，而“卧龙松”为恭亲王所独爱，至今在卧龙松树下仍存有奕訢亲笔题写的卧龙松碑。碑上方篆书：“恭亲王宝”，其下有楷书“卧龙松”三字。

在戒台寺幽静的寺院内典藏着一批工艺精湛、用材珍贵、纹饰华丽的清代古典家具。恭亲王奕訢曾在戒台寺居住过十多年，奕訢和侍从、用人所使用的家具是从恭王府携带而来的。这批古典家具共计77件，至今仍完好地存于戒台寺。其中10件放置于戒坛殿戒坛上的家具属于清代宫廷家具，应是恭亲王奕訢自用家具。现存放于大悲殿中，供游人参观的家具共有67件，一部分是奕訢自己用的宫廷家具，另一部分是供随同的官吏和用人使用的普通家具。

戒台寺现存的与恭亲王有关的文物遗存，是研究清代王府文化的珍贵文化遗产，需妥善保存，深入研究。特别是对奕訢移居戒台寺期间，参与过的重大事件及行动轨迹尚需深入研究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清豫王府留存的石狮

北京城中曾有众多王府，根据史料记载，明代时京城中王府有30座，其中亲王府有19座，郡王府是11座。清代，王府数量逐步增多，至嘉庆年间，王府已达42座，至清末期王府发展到50多座。这些王府经历时代变迁，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，即使有一些留下来的，也已残缺不全了。

如今，提起王府，很多人会联想起“王府井大街”。这个街名的得来，的确与这里曾经有王府有关。《光绪顺天府志》以及《坊巷志》都提到，这里元代为丁字街，明代在此建十王邸于此，遂称王府街。不过，关于十王邸是十座王邸还是排行第十的王子的府邸，历来有多种说法。

清代，这一带的王府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豫亲王府。王府最早的主人是清初“八大铁帽子王”之一的爱新觉罗·多铎（1614—1649）。经过几百年的变迁，豫王府现已无存，唯有

访古录》中曾这样记载：“隋朝帅府遗壁座，崇文门内东单牌楼北之三条胡同”，“考之系隋朝燕王府北平王罗艺之帅府故址，此壁当系府前之影壁。”也就是说，王府井一带，隋代时就有王府存在。

明代这里是都察院所在，1452年，兵部尚书于谦提出建议，在此设团营，都察院又改为帅府，故此地有帅府园之称。因这一带有王府，且发现有一甜水井，清末时人们称之为“王府井”。

清代，这一带的王府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豫亲王府。王府最早的主人是清初“八大铁帽子王”之一的爱新觉罗·多铎（1614—1649）。经过几百年的变迁，豫王府现已无存，唯有

卧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牌匾两侧的两个石狮子是原物，其他均无迹可寻。

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，从小就深受努尔哈赤宠爱，依努尔哈赤制定的八王议政制度，只有7岁的多铎和9岁的多尔衮，都被立为和硕额真。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，多铎被封为豫亲王，掌管礼部事务。

多铎与多尔衮为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他也是多尔衮的得力助手，在征战朝鲜、蒙古的诸多战役中，多铎屡立战功。

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多铎封为豫亲王，授为定国大将军，率军击败李自成。顺治二年，率军攻破扬州，扫除明朝残余势力。这一年，多铎被封为德豫亲王。顺治三年，多铎被任命

为扬威大将军，率军征服了蒙古的苏尼特部。次年，多铎加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。

不过，在多铎盛年时，因感染天花，于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不治而亡，时年36岁。多铎死后，他的第二子多尼承袭了豫亲王的封号，不久改为信亲王，豫亲王府也改为信王府。

多尔衮死后，多铎被封的爵位亦受牵连，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被降为郡王。当时已继袭亲王爵位的多尼，也因父罪，降为信郡王，多尼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去世。多尼之后，几代均袭信郡王，其中有：鄂扎、洞鄂、德昭、如松等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，乾隆皇帝恢复了多铎的豫亲王爵位，此后，德昭

的第十五子修龄，由信郡王改为豫亲王，信郡王府又改称豫亲王府，豫亲王的爵位一直延续至清王朝灭亡。

豫王府建筑宏伟，是清朝最大的王府之一。从清乾隆年间绘制的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上可以看到，当时豫亲王府所在地地图位置还标的是“信郡王”字样，可见乾隆测绘全图时（全图完工于乾隆十五年），这里还是信王府。

豫亲王府有“小紫禁城”之称，从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也能看出该府的规模，它坐北朝南，一座王府把东单三条胡同隔成了东西两半。王府中轴线上的建筑也有“外朝”与“内廷”格局。前部为正殿银安殿，它面阔5间，进深3间，后部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